

朱熹、呂祖謙“三衢之會” 若干問題考辨^{*}

周紀煥 童獻綱

提 要

“三衢之會”是朱熹、呂祖謙在“南宗聖地”衢州舉行的一次重要學術盛會，在朱、呂的學術交往中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長期以來，學界對兩人會見的時間、具體地點等問題多有歧見，本文從歷史地理的角度，通過大量歷史文獻的考辨，對一些流行觀點進行修正，明確了朱、呂“三衢之會”於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在衢州東二十里的石巖寺舉行，於四月七日結束，歷時十天。

關鍵詞：“三衢之會” 朱熹 呂祖謙 聽雨軒 紹德庵 石巖寺 相會時間

建炎三年，孔子四十八世孫、衍聖公孔端友扈蹕南下，賜家衢州。從此，衢州不僅成爲“東南闕里”、“南宗聖地”，也成爲儒學發展、交流的重鎮。其中，“三衢之會”就是朱熹、呂祖謙繼“寒泉之會”、“鵝湖之會”後又一次重要的學術盛會，在朱、呂的學術交往中具有重要的意義。朱、呂“兩人就《詩經》、《尚書》、

* 本文爲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13YJAZH142)、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11FC03YB)研究成果。

《周易》、《春秋》等經學與史學問題進行全面的討論，還進行了儒釋之辯，擺出了兩人思想上的不同點。朱熹對呂祖謙回護陸學的觀點，作了委婉的批評^[1]。“三衢之會”涉及的內容豐富，解決了學術上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想交流，促使朱熹就“道問學”與“尊德性”兩方面進行反思，對其學術思想的發展、成熟具有“頓進之功”^[2]，更是對江南地區學術交流、儒學新發展的重要推動。關於此次相會的時間、地點、內容等信息，在朱、呂兩人的著作中均無明確記錄，這就為後人留下了很多難解之謎，造成學術歧見。為撥開這個迷霧，自明清以來，不斷有學人加以探討。下面就“三衢之會”的有關問題進行考證、分析，就教於方家。

一、“三衢之會”之地點諸說

關於“三衢之會”的地點，至目前為止，主要有三種說法：

一是開化縣的聽雨軒。聽雨軒位於開化縣城北三十五里的馬金，鄉人汪觀國致仕歸建，每天與其弟汪杞講學燕息其中，慶元(1195—1200)間^[3]改建為包山書院。明李賢等《明一統誌》在“包山書院”條下收錄了呂祖謙聽雨軒詩，弘治《衢州府誌》卷十三輯錄朱熹并呂祖謙、張栻、江溥、謝諤、呂祖儉、陸九齡所作《汪端齋聽雨軒》詩七首，崇禎《開化縣誌》以《題聽雨軒》及《聽雨軒》為題輯錄了朱熹等人詩七首，清康熙《衢州府誌》、雍正《開化縣誌》、光緒《開化縣誌》等均有載。今人東景南先生在其1991年版《朱熹佚文輯考》、1992年版《朱子大傳》、2001年版《朱熹年譜長編》等著作中，根據聽雨軒詩，認為“三衢之會”就在開化聽雨軒舉行。“今據此詩，乃得確考，可知兩人非在衢州城中相見，當是(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朱熹於衢哭吊汪應辰後，即赴常山、開化，呂亦由金華趕至，於二十八日與朱會見於開化北汪氏兄弟之宅，朱熹聽雨軒之詠即在其時。張栻、陸九淵、

呂祖儉之詠聽雨軒，蓋與朱熹非在同時也。”^[4]朱熹於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與呂祖謙會於開化，講論學問九日”^[5]。基於此，“三衢之會”被稱作“包山之會”。此說影響甚廣，已成主流，為許多學者、論者所採信，如徐儒宗著的《婺學之宗——呂祖謙傳》說：“三月二十八日……東萊同朱子相會於開化縣北的汪觀國、汪杞兄弟的聽雨軒。”^[6]徐宇寧主編的《衢州簡史》稱“三衢之會”在開化縣馬金聽雨軒內舉行，時間在淳熙三年“農曆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十二日間”^[7]。

二是常山縣的紹德庵或石崕寺。據目前掌握的史料，最早明確提出常山是“三衢之會”所在地的，是清雍正《常山縣誌》編纂者、孔子第六十六世孫孔毓璣。孔毓璣在《朱夫子像贊》一文中指出：“此邦於有宋時，考亭夫子、東萊先生浹旬會講，其載在《朱子全集》、《呂成公遺集》，皆可考而知也。”^[8]該誌所附《朱文公呂成公常山講學考》指出：“（淳熙）三年二月^[9]朱子來三衢哭端明，東萊往會之浹旬。”^[10]光緒《常山縣誌》之《朱子講學考》及編纂者按還指出：“葉秉敬《府誌》云，常山閩楚之會，朱晦庵、呂東萊、張南軒講學於此，故今學者知向方，民無終訟”，“葉寅暘以為講學於常，實非無據”^[11]。其主要依據：其一，“三衢之會”在朱、呂祭祀汪應辰之時，“朱、呂二公皆有祭汪尚書文，二公會講實在此時”^[12]。其二，汪應辰歿於常山球川，而常山為衢州屬邑，朱子來三衢哭應辰之“三衢”即是常山。“汪尚書應辰實歿於球川。顧不言常而言衢者，蓋古稱金華皆曰婺，稱嚴州皆曰睦，則凡衢之屬邑宜皆稱衢，況三衢山在常邑，不在郡城。”^[13]關於汪尚書歿於常山球川的理由，《汪尚書歿於常山考》指出，在朱、呂祭汪應辰的文中，有“僧廬”、“蕭寺”之語，由此判斷“應辰當歿於所寓荒寺中。故《弘簡錄》云至衢無屋可居，《續文獻通考》謂汪公父子寓衢，郡守張嶠集室居之，想也暫寓而非歿於此也。吾球古有邵德庵，朱、呂所云僧廬蕭寺實在此。至庵旁汪墓，則母夫人魯氏葬處。應辰乃歿於此而非墓於

此也。”^[14] 束景南認為“朱熹必是在常山紹德庵祭哭汪應辰”，“僧廬”、“蕭寺”，“均指紹德庵”^[15]。其三，朱子答呂子書信明確不到衢州而直赴常山：“文公欲入城市^[16]，遲明即出，又欲不如衢境，徑趨常山，以官道之旁未為穩便，則當年會講之處在此不在彼，彰彰明矣。”^[17] 具體地點有二說，一在紹德庵：“朱、呂祭汪公文，有僧廬蕭寺之語，則汪公當歿於荒祠中，而邵德似與相符合之。《金華遺事》‘東萊往會之浹旬’，及朱子答書云‘深僻去處踰伏兩三日’，則會講或在此。”^[18] 一在石崆寺，因為石崆寺洞口有朱子題鐫的匾額，“縣南里許，石崆山半有寺，相傳為朱子講學之所，洞口鐫有字，今模糊不可辨”^[19]。

三是衢州石巖寺。潘富恩、徐余慶先生早在1984年就提出朱、呂相會於浙江衢縣，但未言明石巖寺。“淳熙三年(1176)，呂祖謙又與朱熹相會於浙江衢縣。”^[20] 近年，杜海軍先生在《朱熹與呂祖謙三衢之會與〈近思錄〉考》一文中，對束景南先生的開化聽雨軒說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束景南先生注意到了朱、呂二人相會，“但是所論時間和地點卻有些值得商榷處”，“呂祖謙《年譜》明白所說二人會在三衢，所載必定有據，不宜他變”。理由有四：一是呂子《年譜》直寫三衢，不寫與衢州相距頗遠的屬縣開化；二是朱子邀約說的明白，在赴常山前二人會面，而非在後；三是《聽雨軒》詩無明確的年月日，而此時張栻已於淳熙二年春二月在靖江府(今桂林)任上，無相會的可能；四是開化到婺源雖路途曲折，但距離遠短於衢州至金華的距離，朱熹從開化到婺源走了五六日，呂祖謙從衢州到金華用時卻不到三天，“所以呂祖謙與朱熹分手之地所在，合理的解釋絕不會在開化”。據他考證：“朱熹與呂祖謙會面地點當在婺州至衢州途中的安仁和衢州之間的石巖寺，距離衢州二十里路。”^[21]

以上“三說”，所涉及的史料主要有：一是朱、呂間關於“三衢之會”的往來書信；二是朱熹、呂祖謙、張栻的祭汪應辰文；三是呂祖謙的年譜；四是方志中收錄的《聽雨軒》詩。三說中，常

山紹德庵或石崆寺說頗為新穎，提出了汪應辰歿於常山、常山即是“三衢”的論斷。“三說”就以上史料有所考證、分析，但又有所缺漏、有失偏頗，有些問題的考證尚不夠嚴密，還難以令人信服。比較“三說”的分歧，關鍵處有：朱熹、呂祖謙分手後為何朱比呂遲二日才到家？《聽雨軒》詩是否是朱、呂“三衢之會”時的酬唱之作？汪應辰是否歿於常山？兩人相會之“三衢”即指常山嗎？

二、“三衢之會”之“三衢”辨正

首先來探究一下“三衢”與常山的關係。

衢州之得名與境內的三衢山有關。三衢山位於衢州屬邑常山縣北，“三衢山，在縣北二十五里。昔有洪水暴出，分為三道，故名。州名亦取於此。”^[22]葉秉敬根據《爾雅》“四達謂之衢”的解釋，認為：“衢以四達名，不獨以三衢山名也。”^[23]這就引出了朱熹答呂祖謙所言“三衢”是特指衢州還是衢州屬邑常山的問題。

關於“三衢之會”，朱熹先後給呂祖謙寫了五封書信，其中有封信中多次提及“衢”，信中有“須一至衢”，“卻自常山、開化過婺源”，“自金華不入衢，徑趣常山”，“在衢、婺間”，“度月盡可到衢耳”^[24]等言辭，由此看來，儘管常山、開化是衢州的屬邑，但朱熹對此是分辨得很清楚的，絕不會混淆。另一信提到“三衢”，“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25]。從前後兩封信的聯繫看，此“三衢”，顯然指的就是郡城衢州，而非三衢屬邑常山或開化。

在各種歷史文獻中，“三衢”一般有兩種使用情況，一是與人名連用，指稱其籍貫所在的衢州屬邑。如宋代詞人毛滂是衢州江山人，而稱之為“三衢之毛滂”^[26]；北宋《易數鉤隱圖》的作者劉牧，是衢州西安^[27]人，其《易數鉤隱圖》序中署名為“三衢

劉牧撰”^[28]；宋代的江緯，衢州常山人，宋治平四年(1067)遷居開化，有“三衢進士江緯欲更名汝真，來見公(徐神翁)”^[29]的記錄；元代的吾喞，衢州開化人，有“三衢吾先生之在國學，與今翰林編修楊君惟立、劉君景元齊名”^[30]的記述，等等。二是單獨用於地名，往往以“三衢”之屬邑加以明確。如“三衢之江山、常山二水自須溪、金川合流交錯如穀，故名穀江”^[31]；元建德路儒學教諭蔣月林，字桂尚，“其先居三衢之龍遊”^[32]；元朝的堵閏，字濟川，金壇人，於“至順二年七月，奉命督陶器於饒，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33]，等等。由上可知，人們為將專指衢州的“三衢”與三衢山所在地衢州屬邑常山有所區別，一般會用“三衢之”加以明確，以避免產生歧見。元方回在《東萊集抄序》中說得明白，呂子“三年丙申如衢州，哭汪公應辰。又往會晦庵於衢”^[34]。因此，朱、呂會見前商討相會地點，選擇為“三衢”，應該在衢州，而不是在常山，雍正《常山縣誌》等將“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之“三衢”理解為常山是不確的。

其次，來討論一下造成對“三衢”理解偏頗的另一個因素，汪應辰晚年的家安在何處？是在哪兒去世的？

《汪尚書歿於常山考》作者徐烈考證，朱子、呂子祭汪應辰文中有“遄反乎丘林，托僧廬以靜處”，“至於菱落叢祠之秩所，取者甚狹，荒寒蕭寺之居，所處者甚庳”之語句，進而推斷其“當歿於所寓荒寺中”^[35]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斷“荒寒蕭寺”就是常山球川的紹德庵，“朱、呂所云僧廬蕭寺實在此”^[36]，未免失之武斷。

其實，汪應辰一生與“荒寒蕭寺”的關係十分緊密，且都在浙江衢州境內，主要有三處。

其一是常山永年院。

汪應辰是信州玉山(今江西省玉山縣)人，生於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紹興五年(1135)舉進士第一，授鎮東軍簽判。紹興九年(1139)，汪應辰因主張抗金，觸怒了秦檜，“出通判建州，

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爲事”^[37]。浙江省常山縣與江西省玉山縣相鄰，其恩師“中興賢相”趙鼎於“己酉春（建炎三年）遷居衢州”^[38]，寓居常山永年寺，前後有兩年時間，這或爲汪應辰遭貶後選擇寓居常山永年院的重要原因。

常山永年院爲永年寺的後院，《方輿勝覽》、《常山縣誌》均有記載。永年寺在常山縣北三十里，又名黃崗寺，唐大中十年（856）建，宣宗賜額曰“容車”，宋雍熙（984）改元，更名萬壽羅漢寺，宋祥符六年（1013），改賜“永年”。“丞相趙鼎、侍郎魏叟、侍讀范冲避地南來，寓居寺中，有酬唱。”^[39]後人因之於容車山下立有三賢堂，“奉之故名”^[40]。

紹興十六至十七年間，張嶠爲衢州郡守。張嶠守衢期間，頗有政聲，他於紹興十七年（1147）創建思政堂、貢院。期間，張嶠在西安縣治東的菱湖金紫坊，爲汪應辰父子築室居之。此後，其寓所也就成爲朱、呂等的講道場合，後人即此建祠，創建明正書院，元黃滔有記。“（明正書院）在西安縣東。宋汪應辰及子達寓衢，郡守張嶠築室居之。後人即此建祠，咸淳中趙孟奎重建，扁曰‘明正’。”^[41]紹興十七年八月趙鼎於海南去世，第二年“得旨歸葬”於衢州常山。其時，張嶠已從衢州郡守去職而爲敷文閣待制，章傑繼任衢州郡守，汪應辰已爲袁州通判。趙鼎靈柩路過袁州時，汪應辰不畏奸權，特作《祭趙忠簡公文》以示悼念，並派三名士兵護送回常山。

由此可見，汪應辰在常山永年院生活的時間爲紹興九年至紹興十六年（1139—1146）間，前後七年。常山永年院絕不是汪應辰晚年安家所在，也不是其辭世之所。

其二是常山球川紹德庵旁的真如軒。

真如軒是汪應辰爲母親魯氏守墓所建的廬墓。汪應辰母親魯夫人卒於紹興二十六年（1156）十一至十二月間^[42]，汪應辰“廬於墓側”^[43]，丁憂三年。據《汪文定公家傳》，魯夫人去世

後，汪應辰“居憂盡禮，葬於常山之黃岡，遂廬於墓側之永年院，湫隘嵐濕，公居數年弗去也”^[44]。這一記載，描述了汪應辰為母守墓的情形，但顯然將魯夫人在常山球川的墓地與紹興九年汪應辰遭貶後寓居的黃岡山永年院弄混了。據同為常山球川人的徐洪瑄、徐烈考證，汪應辰母親魯氏墓在七都球川。徐洪瑄明崇禎間補邑弟子員，他說：“蓋應辰母出球川魯氏，母死因葬於球。……應辰曾為母家建廳，至今呼為大廳魯，又有汪家廳。則傳所云應辰廬墓者，斷在是矣。應辰居大峽，其外舅喻玉泉樗居下喻，其地皆與球密邇。”^[45]徐烈是清雍正歲貢，其考云：“球川古有紹德庵，庵旁有墓，訛傳汪尚書墓，不知乃母夫人魯氏墓。魯氏出於球川，故葬焉。尚書廬於此。”^[46]

關於真如軒，自宋以降，都有詩作吟詠。如朱熹《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庵真如軒寫呈伯時季路二兄》詩：“先生可是愛吾廬，來往鄰庵幾閏餘。柏下竟開千歲室，竹間猶插萬簽書。”^[47]楊萬里有《題汪聖錫墳庵真如軒在玉山常山之間》詩，中云：“玉山先生攜老禪，把茅結庵開小軒。身前身後來醉眠，一醉不醒三千年。先生杖屨半宇宙，每到此軒去還又。”^[48]宋代樓鑰《寄題汪端明墓庵真如軒》有這樣的詩句：“山藏佳處竹藏廬，見說離家百里餘。”“萬個篔簹一草廬，傷心埋壁十年餘。”^[49]由是觀之，常山球川紹德庵旁的真如軒確實是汪應辰為母盡孝的廬墓，但僅是其生前探訪讀書之所，而非其居家之地，更非辭世之處。

其三是柯山之“蕭寺”。

汪應辰自紹興十六至十七年間由常山永年院遷居衢州城始，即與衢州建立起更密切的聯繫。

紹興二十六年(1156)閏十月甲寅，因母老乞外獲准，“尚書右司郎中汪應辰直秘閣知婺州”^[50]，以便於照顧在玉山的母親，衢州是其往返必經之地。紹興三十一年(1161)冬十月戊申，汪應辰由吏部尚書侍郎“充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虞允文有言，“今若藉其才以禦外侮，則衢郡不為邊

要”^[51]，這除了因汪應辰對衢州的熟知外，更見朝廷對他的倚重。五個月後，於紹興三十二年（1162）三月庚戌，“權尚書戶部侍郎兼權國子祭酒汪應辰兼侍講，進講《春秋》”^[52]，離開衢州。

呂祖謙於乾道五年（1169）八月“二十七日如三衢，見汪公聖錫。十月七日歸自三衢。”^[53]由此可見，汪應辰此時又回到了衢州。後又短暫離開衢州，於“乾道六年（1170）五月十六日到任（平江府），九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54]。乾道七年（1171）正月二十八日，呂祖謙有《尚書汪公得請次對奉祠餞者十有四人分韻賦詩某得敢字》詩，中有“公歸寧久闊，別意不成慘”的詩句，可見汪應辰此時已經去職回家。汪應辰晚年會將家安在何處呢？

乾道九年（1173）正月十三日范成大到衢州，“十四日，前吏部尚書汪公聖錫亦自玉山來，同赴郡中敷文閣待制張幾仲燈宴”，“十五日、十六日，謁公於超化寺之兩山閣，留飯，與前館職鄭升之公明偕”^[55]。據此，汪應辰至遲於乾道七年正月就回到了第二故鄉衢州，安家於超化寺。超化寺在衢州府城北隅^[56]，“左右菱茨池數百畝，地勢幽閭，士大夫多寓居。寺後附城有雲山閣，閣下寢堂三間”^[57]。北宋趙清獻寫有《寄超化長老》一詩，元朝吳師道《衢州超化寺》有“前朝老屋半傾欹，尚思諸賢會集時”的詩句。汪應辰於正月十四日“自玉山來”衢，會見老友，並不意味其晚年安家在玉山。汪應辰早年舉進士後，即將祖業悉數讓給兄長，“應辰最篤友愛，祖業悉讓兄。至衢無屋可居，不顧也”^[58]。因此，汪應辰在玉山已經沒有家業，此次到玉山，只是正月間的一次走親訪友而已，得知好友來衢，即返家會晤，並連續在第二、第三天留客人吃飯，以盡地主之誼。

從淳熙年間呂祖謙與汪應辰的交往看，也可佐證汪應辰晚年將家安在衢州。淳熙元年六月，金華連下大雨，呂祖謙對汪應辰關懷備至，致書問候：“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

不知三衢復如何?”^[59]期間,汪應辰有遷往江西上饒的念頭。淳熙元年,呂祖謙在致汪應辰的信中問及“上饒之居有定議否”^[60],但最終沒有成行。淳熙二年(1175)三月,呂祖謙入閩經過衢州時,曾拜謁汪應辰,入住超化寺。“二十三日,三十五里,衢州。謁汪尚書,遂館於超化寺。”^[61]

因此,汪應辰晚年家安在衢州超化寺是確切無疑的。宋末元初詞人、學者周密《癸辛雜識》云:“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南者衆,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夫許占寺宇之命。今時趙忠簡居越之能仁,趙忠定居福之報國,曾文清居越之禹迹,汪玉山居衢之超化。”^[62]《永樂大典》也載明,“端明寓城中超化之雲山”^[63],指的就是晚年這段時間。朱子答呂伯恭書云:“只擬夜入城寺,遲明即出。”^[64]“城寺”顯然是指超化寺,這充分說明朱熹知曉汪應辰宅於此,逝於此,到衢後即直奔寓所祭奠。東景南先生也認為“汪應辰晚年乃居三衢,後卒於此”^[65]。

在張南軒祭汪端明文中,有這樣一段話,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重視。“晚卧柯山,靜觀其旋。玩心於羲經,不自放而益虔。隱聲實之逾隆,佇側席之招延。何大命之止斯,歎莫返於逝川。痛易簣於蕭寺,無居宅之一椽。”^[66]柯山即為衢州市東南10公里處的爛柯山,晉時樵夫王質遇仙處。爛柯山麓有寶巖寺、仙集觀(一說集仙觀),明胡翰在《青霞洞天遊記》、田藝蘅在《爛柯遊覽紀行》均有提及。其中田藝蘅於嘉靖二十七年春正月遊歷爛柯山,曾“小酌仙集觀”,第二天又“宿山下寶巖寺”。顯然,張南軒在祭文中是以柯山指代衢州,而當時衢州的寺觀較多,道教、佛教的氛圍較濃,而這一切恰恰與晚年汪應辰的心境相切合,也是其孜孜以求的。

綜上所述,汪應辰的晚年是在衢州度過的,逝於超化寺。朱、呂、張在祭文中指汪應辰去世之所為“僧廬”、“蕭寺”,就在衢州城北的超化寺,而非常山球川紹德庵旁的真如軒。

三、聽雨軒詩作於何時

從所搜集的史料看，最早輯錄聽雨軒詩的是明代李賢等《明一統誌》，但僅有呂祖謙的詩，不見朱子及其他人的詩，至明弘治《衢州府誌》，始見收集最齊全的朱熹、呂祖謙、張栻、江溥、謝諤、呂祖儉、陸九齡等人的聽雨軒詩。這表明自明代始，人們就從聽雨軒詩著手“三衢之會”的研究，但都未確認“三衢之會”就在聽雨軒。

嘉靖《浙江通誌》對汪觀國、汪杞兄弟每日在聽雨軒內“講學燕息”，有“呂東萊、朱晦庵、陸象山三先生皆賦詩美之”^[67]的記述。崇禎《開化縣誌》則在多卷中作了相互補充，晦翁“嘗至開化潭口訪江淇，又作《聽雨軒》詩贈汪觀國、汪杞兄弟”^[68]。從編纂者的表述分析，顯然是想將朱子訪江淇與作《聽雨軒》詩聯繫在一起。江淇有個學生弟弟叫江渚，四五歲時，其弟突然語云：“後園梨落籬，問君知不知？”江淇即答曰：“不因風擺樹，定是鳥踏枝。”被時人稱為二神童。江淇後任江山教諭，所居潭口，距縣東三里處，有渡，“在鍾秀門外，船一隻，夫一名”^[69]。這正是朱子回婺源必經之地。江淇居所亭前有塘五畝，遍植芰荷，中起月波臺。朱子拜訪時，“手題其居，曰‘南山南’，又賦《月波臺》詩，以紀其事”^[70]。與朱熹在常山紹德庵祭哭汪應辰所作的《次延之年兄韻敬題紹德庵真如軒寫呈伯時季路二兄》詩一樣，《月波臺》詩也不見於呂祖謙的著作，這說明此次朱熹經常山、開化回婺源省墓，呂祖謙並沒有一同西進，陪同在側，從另一個側面佐證兩人相會地點不在常山、開化。此外，衢州與開化相距一百八十里，“陸路，（開化）東南一百八十里至府治”^[71]，加之聽雨軒在開化縣北三十五里處，衢州至聽雨軒約二百一十五里。朱熹要於三月二十七日在衢州哭祭汪應辰之後，於第二天逆流而上，趕到二百多里外的聽雨軒與呂祖謙相會，中

途還要到常山球川紹德庵旁的真如軒憑吊,是難以想像的,足見東景南先生觀點之謬。故此,朱、呂同韻的聽雨軒詩,並非作於淳熙三年三四月間的“三衢之會”。

明嘉靖《衢州府誌》有載:“時朱晦庵自建安過,東萊講道。見其穎悟,甚加稱獎。後偕張南軒、陸象山、呂公祖謙各賦聽雨詩以美之。”^[72]崇禎《開化縣誌》也有相同的記述。從晦庵自建安過、東萊在聽雨軒講學的時機判斷,唯有“鵝湖之會”結束之後。

“鵝湖之會”於淳熙二年(1175)六月七日結束,衆人於六月八日辭別。呂祖謙回金華,必經開化、常山、衢州,而開化縣北三十五里的馬金聽雨軒,即爲其門人汪浚的家,“淳熙間,汪觀國,字廷光,既仕而歸,於居左建逍遙堂,翼以軒,扁曰‘聽雨’。日偕弟杞端齋論道游燕卒歲。觀國復遣子浚游呂東萊之門。”^[73]因此,呂祖謙於回家途中至聽雨軒講學,是很自然的選擇。據呂祖謙年譜載,“鵝湖之會”後,其“歸至三衢,又留旬日,乃歸”^[74]。而在淳熙元年的五六月間,呂祖謙就來過衢州,講學應該是其主要活動,只是陸九淵從京都臨安來婺州拜訪他而提早結束了行程。“五月十三日,如三衢。二十六日,陸九淵自臨安來。六月一日歸自三衢。”^[75]儘管呂祖謙自四月初一日至五夫訪朱元晦,兩人共同編定了《近思錄》,又一道從崇安赴鉛山鵝湖,切磋學問已有兩月餘,但朱熹沒有與呂祖謙就此分手,而是隨呂祖謙到了開化聽雨軒。這符合呂祖謙赴寒泉之會前的打算,他在淳熙元年與汪端明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儻渠出,果有嫌,則某卻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款待。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待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爲慰。”^[76]從實際情況看,朱熹“款待”呂祖謙兩個多月,又從崇安一路陪送到鉛山,出於朋友之情,呂祖謙自然會邀請朱熹與自己同行,經衢州回崇安。何況,在“鵝湖之會”上,經激烈辯論,朱、陸雙方學術觀點仍然相左,朱、呂之間也有繼續交流的需要。

朱熹有首《分水鋪壁間讀趙仲夔留題二十字戲續其後》的題詠詩：“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東景南先生認為，此詩乃朱熹於鵝湖之會結束後所作，“歸經分水嶺時作此詩，觀詩意，乃就鵝湖之會有感而發也”^[77]。分水嶺在崇安縣石雄里，界於江西鉛山與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之間，也是朱、呂共赴鵝湖之會的必經之地。其實，從這首詩的詩題、詩意看，應是赴會途中所作。詩題“戲續其後”四字，既說明了創作的緣由，更傳神地表達了其在眾友陪同下與陸氏兄弟相會的輕鬆心情以及對相會結果的期待。若是返途所作，“戲續其後”則有揶揄、戲謔之意，因學術觀點的不同而對陸氏兄弟進行諷刺，那朱熹的胸襟未免過於狹窄，這也不合朱熹的為學與為人之道。事實是，朱陸在“鵝湖之會”上各抒己見，展開針鋒相對的激烈辯論，但無絲毫攻擊之意。事後各自在與學生論及對方時，傾慕之情仍溢於言表。淳熙六年（1179），朱熹出任南康太守，陸九淵前往拜訪，而朱熹則請他到白鹿洞書院講學，並將其講稿刻在石碑上以為紀念。

因此，朱、呂的聽雨軒詩作於淳熙二年（1175）六月“鵝湖之會”後訪問聽雨軒之時，張栻等人的聽雨軒詩則是在以後交往中的應和之作。

四、“三衢之會”確切之所

“三衢之會”既不在開化聽雨軒，也不在常山紹德庵或石嵛寺，那究竟在何地呢？

何時何地進行“三衢之會”，朱、呂之間有過多次探討。從已有的史料看，朱熹在會見前後給呂祖謙寫了五封書信，而呂祖謙的回函則未見。從朱熹給呂祖謙的書信看，主要明確了這樣幾個問題：一是驚悉汪應辰逝世，出於尊敬與情義，“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二是在時機上，選擇在回婺源展墓時順道祭

奠,“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三是鑒於歷史和現實的考慮,此次出行要做到秘而不宣,“幸勿語人也”;四是商量行走的路綫、會見的具體地點,“更熟籌度之”;五是會見時間的約定,“行期想只數日間”,“度月盡可到衢耳”。對於會面的地點到底在哪兒,下面這封信,值得深究。

承喻以期會之所,甚幸。但區區此行,迫不得已,須一至衢,正以不欲多歷郡縣,故取道浦城以往。只擬夜入城寺,遲明即出,卻自常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爲人所知,招致悔咎。今承誨諭欲爲野次之款,此固所深願。但須得一深僻去處,踰伏兩三日乃佳。自金華不入衢,徑趣常山道間尤妙。石巖寺不知在何處,若在衢、婺間官道之旁,即未爲穩便。蓋去歲鵝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善地矣。更熟籌度之。又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度月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介馳報,回日即告喻以定處爲幸。^[78]

這封答呂祖謙的信,是探討“三衢之會”十分重要的文獻,除了談及出行的時間、路綫外,重點提出了會見要力避“爲人所知、招致悔咎”的要求,會見地點須“深僻”,對自己不熟悉石巖寺所處地理位置也提出了看法,這是朱、呂幾次通信中唯一提及的一個地點。

對於朱熹的這種謹慎,呂祖謙是十分了解的,有時還不以爲然,他在淳熙元年給汪端明的最後一封信中說:“朱元晦約來春至婺,因爲天台、雁蕩之遊,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爲疑,此誠過慮。告試爲斟酌。”^[79]由此可見,呂祖謙提出在石巖寺相會,是經過“斟酌”的。

石巖寺,位於衢州城東二十里的天保鄉十八都石巖寺村^[80](今爲衢江區樟潭鎮紅星村),也名仙巖、仙巖寺、壽聖仙巖院,

於“天保建，宋熙寧元年(1068)賜額”^[81]。嘉慶《西安縣誌》載，石巖寺“在縣東二十里。層巒疊嶂，圍合如屏。中有巨巖，號爲金仙，深廣十餘丈，高半之。清泉自石罅流出，冬夏不竭。住僧即巖爲寺，後復增建禪宇。林花掩映，亦一勝迹”^[82]。清陳聖澤、余本然等有詩。呂祖謙對石巖寺也比較熟悉，他於淳熙二年三月入閩時曾造訪過。《入閩錄》記錄說：“二十三日，三十五里，衢州。……未至衢二十里，下道數百步，有石巖寺。巖頗敞，然氣象庫陋。”^[83]

由此看來，石巖寺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一是遠離郡城，在衢州城東二十里的鄉村；二是在衢、婺間，滿足“自金華不入衢”以避人耳目的要求，水陸交通便利，利於兩人的進出；三是具有怡人的自然風景和濃郁的文化氛圍，利於學術交流；四是“氣象庫陋”的寺廟，既能滿足基本的生活所需，又無過多香客的騷擾。儘管石巖寺就在衢、婺之間的官道旁，但是非常“穩便”，完全符合“野次之款”的要求。

五、“三衢之會”之時間

汪應辰於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去世^[84]，朱熹知悉後，即籌劃乘回婺源展墓之機，順道至三衢哭祭汪應辰。他在淳熙三年正月晦日給呂祖謙的信中說：“即欲奔往哭之，又不敢輒至近甸。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85]在具體的時間安排上，一直在溝通、商議，“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度月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到浦城，專遣一介馳報”，“行期想只數日間”^[86]。據朱熹的《祭汪尚書文》，其於三月二十七日抵達衢州的超化寺祭祀汪尚書，“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侄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於近故端明殿學士、尚書汪公之靈。”^[87]

這與“度月盡可到衢”的計劃是吻合的。

呂祖謙先於朱熹於淳熙三年正月十二日來衢祭奠汪應辰，“正月十二日，如三衢，哭汪公，有祭文”^[88]。因此，朱熹三月二十七日的祭奠，並沒有呂陪祭。那麼“三衢之會”時，呂祖謙是何時抵達衢州的呢？

據呂祖謙年譜，其於淳熙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往會朱編修於三衢”^[89]。學界對此有不同的理解，東景南認為朱、呂二十八日會於開化聽雨軒^[90]，杜海軍認為呂祖謙二十八日才從金華出發，三十日會見朱子^[91]。“往”有“去”、“到”之義，如果作“到”解，則兩人前後相差一天抵三衢，在呂氏已先於朱氏祭拜汪應辰的背景下，是正常的、可理解的。若理解為“去”，即二十八日才從金華動身前往三衢。金華“西至衢州府治一百九十里”^[92]，根據呂祖謙淳熙二年(1175)《入閩錄》所載，金華到衢州的實際距離為一百八十里，每天行程七十來里，前後花了兩天多時間。第一天行走七十里，“淳熙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早發婺州。二十五里，馬海廣教寺。三十里，湯塘，入衢州龍遊縣界。十五里，宿小龍遊。”第二天行走七十五里，“二十二日，十里，湖頭。三十里，龍遊縣。三十五里，宿安仁”。第三天走了三十五里，“二十三日，三十五里，衢州”^[93]。照此推算，呂祖謙則要遲至三十日才能到衢州相會，朱熹要獨自在衢等候三天，這會弄出很大的動靜，不僅有失禮數，更不符合朱熹對這次相會提出的要求。有論者提出呂祖謙於三月二十三日嫁女兒華年，諸事繁忙，才於二十八日動身，這也沒什麼道理。因為嫁女即便是家庭大事，一般都是忙於前而非忙於後。如果呂祖謙二十八日到衢，則應在二十六日從金華出發，這應該是女兒出嫁後的第三天，嫁女的後續事宜此時也應辦結。這在呂祖謙給周必大的信中可以得到佐證，“數日前已了女子婚事，自此瀟然，真無一事矣”^[94]。由“數日前”判斷，這封信應該是呂祖謙赴“三衢之會”前寫給周必大的，也就是說呂祖謙是帶著嫁女後的極大幸福感和輕鬆愉悅心情，

前往衢州與老友相會的。再者，如前所述，在會見時間的約定上，朱、呂之間保持著很好的溝通，且朱熹到浦城後會“專遣一介馳報”，對相見時間的安排會十分準確，呂祖謙擇定女兒的婚期為三月二十三日，是經過精心謀劃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斷不致於自己單方面延宕三天才到達衢州與老友相會！朱熹若果真按約於二十七日“夜入城寺”，二十八日“遲明即出”，而呂祖謙從金華到衢州僅需兩天半的時間，那麼兩人於二十八日的上午即能在衢州城東二十里的石巖寺相見，可見時間安排非常恰當。因此，“二十八日，往會朱編修於三衢”的語意自明，呂祖謙於三月二十八日到達衢州，與業已完成祭奠汪應辰之靈的朱熹相會。

朱熹於四月“十二日早達婺源”^[95]，呂祖謙於“四月十日歸自三衢”^[96]。金衢相距一百九十里，以三天計算呂祖謙的回程，則可推知他與朱熹分別是在四月八日。朱熹回家比呂祖謙晚了兩天，符合朱、呂在衢州石巖寺分別，而衢州至婺源的距離較衢州至金華的距離要遠一倍的實際。

朱熹在婺源的祖居位於婺源紫陽鎮南門街，衢州至婺源，要經過常山、開化。開化縣在衢州西北，到婺源可走的路綫有三條：一是從西北走濟嶺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婺源縣際嶺界八十里，自界至縣一百里”^[97]。二是從西南走大鱗嶺一百九十里，“（婺源）東至大鱗嶺凹頭抵開化界，一百一十里，自界至開化縣八十里”^[98]。三是從開化北經休寧到婺源，達四百六十里，其中開化至休寧二百四十里，開化“北一百二十里，至江南徽州府休寧縣界江嶺，自界至縣一百二十里”^[99]，而婺源至休寧則有二百二十里，“（婺源）北至上汪抵休寧界一百四十五里，自界至休寧縣七十五里”^[100]。從路程的遠近及便利程度看，自開化入婺源，一般選擇從西南入境，共三百七十里，較西北綫路遠了十里。水路，主要是衢州到開化段，有二百里，較陸路僅遠二十里。“水路，（開化）東南二百里，至府治”^[101]，其中常山到衢州一百

里,“水路,(常山)東一百里,至府治”^[102]。但開化縣南三十里的華埠鎮“始通舟筏,自常山至縣,此爲通道”^[103]。總之,從衢州出發,經常山、開化到婺源,陸路三百七十里左右,水路三百九十里。

那麼,從衢州至婺源三百多里路,朱熹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到達呢?

呂祖謙《入閩錄》對經衢州、江山、浦城到福建崇安縣五夫與朱子相會的行程,有比較詳細的記載,這與朱熹從衢州至婺源的路綫,不論是距離,還是路途狀況,均具有很大的可比性。就此作些考察,對問題的解決會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從衢州到崇安五夫,共四百里。衢州至江山縣七十五里,江山“在府西南,去府治七十五里”。江山至浦城二百二十五里,江山“南一百二十五里,至福建建寧府浦城縣界小竿嶺底,自界至縣一百里”。浦城縣“北抵浙江衢州府江山縣大竿嶺界,一百里”^[104]。浦城至崇安一百里,浦城與崇安縣交界有八處,其中浦城縣村頭鄉與屬於今天五夫鎮的澄溪村交界,“距城一百里”^[105]。

這四百里路,呂祖謙於三月“二十五日早發衢州”,四月初一日“至五夫,訪朱元晦”,路途所用時間前後共七天,平均每天行走六十里不到。期間,二十五日從衢州出發到江山“宿白肚”,走了七十一里。二十六日過江郎山“宿麥嶺”,“自衢至此,皆平土。過此以往,重山複嶺,漸類閩中”,行走六十五里,二十七日到福建浦城“宿柳樹”,行走五十五里^[106]。可見,盤旋於崇山峻嶺的山路要難走費時的多,但最少一天也能行走五十五里。

至於古人的行走速度,旅遊家徐霞客的《閩遊日記》也可作參考。徐霞客於崇禎改元(1628)三月第一次入閩遊歷時,在十二日由仙霞嶺進入福建,走了八十里,十三日則走了六十五里。走水路,順流而下,速度則要快得多,如十五日“辨色即行。懸流鼓楫,一百二十里”,十七日“水漲數丈,同舟俱閣不行。上午

得三板舟，附之行。……過如飛鳥”^[107]，共走了一百二十里。

由此可見，古時一般人走陸路，如果路途比較平坦，則一天能行七八十里路，而崇山峻嶺的山路則難行得多，一天能走五六十里。如果是水路，儘管水路比陸路會遠一些，但速度快，順流而下可達一百二十里。

以這樣的速度來測算朱、呂在衢州石巖寺分別後朱熹的行程，是比較可靠的。衢州到開化一百八十里，可水陸並行，儘管是逆流而上，二天時間應該足夠了；開化至婺源一百九十里山路，會難行得多，但與衢州境內的江山至崇安“重山複嶺”的路況相比，算得上平夷了，即使以一天五十至六十里計，需三至四天時間，這樣，共需五至六天時間。由於朱熹是四月十二日早到達婺源的，可以扣除一天，實際是五天時間。這樣，與呂祖謙到家的時間相吻合，也與朱熹《答呂伯恭》說“別忽五六日”^[108]相吻合。

從這個角度看，朱、呂“三衢之會”的地點在開化的聽雨軒是多麼地不可信！試想，走西北路綫，開化到婺源一百八十里，而馬金在開化北三十五里，這樣朱熹從開化馬金直接到婺源只有一百四十五里，而從馬金到金華卻有四百零五里。不論開化到婺源的路是多麼艱險難行，以每天五十里計，三天足夠了；也不論開化到金華的水路是多麼地順遂，以每天一百二十里計，至少也需三天。但兩人實際到家的時間，呂祖謙卻比朱熹早兩天，這無論如何是解釋不通的。所以呂祖謙與朱熹分手之地，合理的解釋絕不會在開化馬金聽雨軒，也不在常山的紹德庵或石嵒寺，而就在衢州的石巖寺。

綜上所述，朱熹於淳熙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到衢州市城內的超化寺祭奠汪應辰的靈位後，三月二十八日與從金華趕到的呂祖謙會於衢州市城東二十里的石巖寺。會講於四月七日結束，四月八日兩人告別回家，前後十天時間，大大超過“跼伏兩三日”的預期。《金華遺事》、孔毓璣所持朱、呂會講“浹旬”是準確的。

朱、呂分別後，朱熹順道還到常山球川的真如軒憑吊汪應辰，到開化潭口訪問江洪。

(作者：衢州學院教師教育學院教授)

注釋：

- [1] 張豈之主編，李似珍著：《中國學術思想編年·宋元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353頁。
- [2]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二，宋刊浙本。
- [3] 據崇禎《開化縣誌》卷六。《明一統志》卷四三、《續文獻通考》卷六一為紹定(1228—1233)中改為書院。
- [4] 東景南：《朱熹軼文輯考》，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09頁。
- [5] 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6] 徐儒宗：《婺學之宗——呂祖謙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2頁。
- [7] 徐宇寧：《衢州簡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3頁。
- [8]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 [9] 應為三月之誤。
- [10]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 [11] [清]李瑞鍾：《(光緒)常山縣誌》，卷末，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 [12]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 [13] 同上注。
- [14] 同上注。
- [15] 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57頁。
- [16] 據《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答呂伯恭書》，“城市”應是“城寺”之誤，指的是超化寺。一字之差，但對“三衢之會”地點的理解卻有很大關係。詳見本文

第三部分。

- [17]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 [18] [清]李瑞鍾：《(光緒)常山縣誌》，卷末，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 [19] 同上注。
- [20] 潘富恩、徐余慶：《呂祖謙思想初探》，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0頁。
- [21] 杜海軍：《朱熹與呂祖謙三衢之會與〈近思錄〉考》，衢州市衢商研究會會刊(內部資料)《衢商文化》，第25期，第49—50頁。
- [22] [清]楊廷望：《(康熙)衢州府誌》，卷三，光緒八年重刊本。
- [23] [明]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誌》，《畫圖序說二十四條》，明天啓二年刊本。
- [24]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
- [25] 同上注。
- [26] [清]朱彝尊：《孟彥林詞序》，《曝書亭集》卷四〇，刊本。
- [27] 衢州春秋時爲姑蔑地，漢初平三年析太末縣置新安縣，晉初改新安。唐始以西安名縣，隸屬衢州。今析爲柯城區、衢江區。
- [28] [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序》，《道藏·洞真部·靈圖類》。
- [29] [宋]朱宋卿編：《虛靖沖和先生徐神翁語錄》，卷上，《正統道藏》正一部。
- [30] [明]莊昶：《送吾景端先生東歸序》，《(光緒)開化縣誌》，卷一一，清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 [31] [元]邵亨貞撰，[明]汪稷校：《蟻述詩選》，卷四，明好德軒刻本。
- [32] [明]韓晟等修，毛壹鷺撰：《(萬曆)遂安縣誌》，卷三，明萬曆四十年修鈔本。
- [33] [元]脫因修，[元]俞希魯纂：《(至順)鎮江誌》，卷一九，清道光二十二年丹徒包氏刻本。
- [34] [元]方回：《東萊集抄序》，《桐江集》，卷一，宛委別藏清抄本。
- [35]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〇上，清雍正二年刊本。
- [36] 同上注。
- [37] [元]脫脫等：《宋史》，卷三八七，武英殿本。
- [38] [宋]趙鼎：《自志》，《家訓筆錄》，卷一，清函海本。
- [39] [宋]祝穆：《方輿勝覽》，卷七，宋刻本。

- [40] [明] 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志》,卷一,明天啓二年刊本。
- [41] [明] 李賢:《明一統志》,卷四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42] 同治《玉山縣志》卷九之中載,紹興二十六年“八月魯夫人薨”,誤。汪應辰於紹興二十六年八月遷右司,因母老乞外,于同年閏十月甲寅出知婺州。如若魯夫人薨于八月,則汪應辰斷不能于同年閏十月出知婺州。且從汪應辰服闋除秘書少監的時間是在紹興二十九年十二月戊辰判斷,魯夫人去世時間也不在八月。
- [43] [元] 脫脫等:《宋史》,卷三八七,武英殿本。
- [44] [清] 黃壽祺修,吳華辰、任廷槐纂:《玉山縣志》,卷九之中,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 [45] [清] 孔毓璣:《(雍正)常山縣志》,卷一二,清雍正二年刊本。
- [46] [清] 李瑞鍾:《(光緒)常山縣志》,卷末,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 [47] [宋] 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一〇,宋刊浙本。
- [48] [宋] 楊萬里:《誠齋集》,卷三〇,影宋寫本。
- [49] [明] 樓鑰:《攻媿集》,卷八,上海涵芬樓景印武英殿聚珍本。
- [50] [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51] 同上書,卷一九三。
- [52] 同上注。
- [53] [明] 阮元聲:《東萊呂成公年譜》《宋東萊呂成公外錄》本。
- [54] [宋] 范成大:《(紹定)吳郡志》,卷一一,宋紹定二年重刊吳興張氏《擇是居叢書》本。
- [55] [宋] 范成大:《驂鸞錄》,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 [56] 據宋洪邁《夷堅志》。鄭永禧《衢縣志》卷四,引嘉慶縣志,超化寺在縣治東。
- [57] [宋] 洪邁:《超化寺鬼》,《夷堅志》,乙志第十八,清影宋抄本。
- [58] [清] 孔毓璣:《(雍正)常山縣志》,卷八,清雍正二年刊本。
- [59] [宋]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七,明成化七年刻本。
- [60] 同上注。
- [61] [宋] 呂祖謙:《東萊集》,文集卷一五。
- [62] [宋] 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73頁。
- [63] 《堂名二十三》,《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七。

- [64] [宋] 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 [65] 束景南：《朱子大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60頁。
- [66] [宋] 張枋：《南軒集》，卷四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67] [明] 胡宗憲、薛應旂：《（嘉靖）浙江通誌》，卷七，嘉靖四十年刊本。
- [68] [明] 汪慶百：《（崇禎）開化縣誌》，卷五，明崇禎刻本。
- [69] [明] 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志》，卷一二，明天啓二年刊本。
- [70] [明] 汪慶百：《（崇禎）開化縣誌》，卷五，明崇禎刻本。
- [71] [明] 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志》，卷一一，明天啓二年刊本。
- [72] [明] 趙鏜：《（嘉靖）衢州府志》，卷四，余紹宋傳抄、葉渭清手校本影印本。
- [73] 同上注。
- [74] [明] 阮元聲：《東萊呂成公年譜》《宋東萊呂成公外錄》本。
- [75] 同上注。
- [76] [宋]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七，明成化七年刻本。
- [77]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78] [宋] 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 [79] [宋] 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七，明成化七年刻本。
- [80] [明] 王懋德等修，陸鳳儀等編：《（萬曆）金華府誌》，卷二，萬曆六年刊本。
- [81] [明] 林應翔等修，葉秉敬等纂：《（天啓）衢州府志》，卷一五，明天啓二年刊本。
- [82] [清] 姚寶燿等修，範崇楷等纂：《（嘉慶）西安縣誌》，卷四四，民國六年重刊本。
- [83] [宋] 呂祖謙：《東萊集》，文集卷一五，明成化七年刻本。
- [84] 據呂東萊年譜。同治《玉山縣誌》載《文定家乘》，以為汪逝於十二月十二日。宋史本傳雲汪應辰於淳熙三年二月卒於家，明顯誤甚。
- [85] [宋] 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 [86] 同上注。
- [87] [宋] 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八七，宋刊浙本。
- [88] [明] 阮元聲：《東萊呂成公年譜》《宋東萊呂成公外錄》本。
- [89] 同上注。

- [90]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558頁。
- [91] 杜海軍:《朱熹與呂祖謙三衢之會與〈近思錄〉考》,衢州市衢商研究會會刊(內部資料)《衢商文化》,第25期,第49—50頁。
- [92] [明]王懋德等修,陸鳳儀等編:《(萬曆)金華府誌》,卷二,萬曆六年刊本。
- [93] [宋]呂祖謙:《東萊集》,文集卷一五,明成化七年刻本。
- [94] [宋]呂祖謙:《東萊集》,別集卷九,明成化七年刻本。
- [95]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 [96] [明]阮元聲:《東萊呂成公年譜》《宋東萊呂成公外錄》本。
- [97] [清]孔毓璣:《(雍正)常山縣誌》,卷一,清雍正二年刊本。
- [98] [民國]葛韻芬等修,江峰青纂:《重修婺源縣誌》,卷二,民國十四年刻本。
- [99] [清]楊廷望:《(康熙)衢州府誌》,卷二,光緒八年重刊本。
- [100] [民國]葛韻芬等修,江峰青纂:《重修婺源縣誌》,卷二,民國十四年刻本。
- [101] [清]楊廷望:《(康熙)衢州府誌》,卷二,光緒八年重刊本。
- [102] 同上注。
- [103]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九三,清稿本。
- [104] [清]朱衣點修,翁昭泰纂:《(光緒)浦城縣誌》,卷二,清光緒二十六年刊本。
- [105] 同上注。
- [106] [宋]呂祖謙:《東萊集》,文集卷一五,明成化七年刻本。
- [107] [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卷一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6頁。
- [108] [宋]朱熹:《晦菴先生文集》,卷三三,宋刊浙本。

On the Symposium at San Qu Hosted by Zhu Xi and Lü Zuqian

Zhou Jihuan Tong Xian-gang

(Professor, College of Teacher Education, Q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Zhu Xi and Lü Zuqian once held a symposium at San Qu, which w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event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intellec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cholar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disagreements on certain issues, for instance, the time and venue of this meeting. Through careful examination of a large bod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present essay examines these issues from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It modifies some commonly accepted views by presenting more accurate details. For example, the venue of Zhu and Lü's meeting was Shiyan Monastery, twenty *li* east of Quzhou, and the 10-day symposium was held from the twentieth of the third month to the seventh of the fourth month in the third year of the Chunxi reign period (1176).

Keywords: A Symposium at San Qu, Zhu Xi, Lü Zuqian, Studio of Listening to the Rain, Studio of Continuation of Virtue, Monastery of Rock Precipice, time of meeting